

中国小说史研究丛书

中国武侠小说史

罗立群著



罗立群著

中国武侠小说史

Zhongguo Wuxia Xiaoshuoshí

罗立群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5,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1/2 插页: 2
印数: 1—1,345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曹雅文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1246-5/I·99

定 价: 6.10元

序

朱一玄

罗立群同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经过长时间辛勤撰写，现在厚厚的书稿摆上我的案头，不由得在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虽然源远流长，但直到最近几年，国内才有人作比较系统的研究，继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了王海林同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之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又将出版罗立群同志的新著，无疑地，这都是在武侠小说系统研究上筚路蓝缕的开创之作。

《中国武侠小说史》和《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一样，是贯通古代和当代的武侠小说通史，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一般都截止到“五四”运动；“五四”以后的部分，划归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难以使人得到完整的印象。现在改变了过去的划分法，从古代雏形期一直叙述到兴旺发达的当代，这在文学史的编辑体例上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也是有开创意义的。

过去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范围，往往只着眼于大陆的作家作品，忽略了港、台及海外的作家作品。这部武侠小说史，开扩视野，除收大陆的作家作品外，还收入了港、台以及海外的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作家的作品，大大丰富了武侠小说史的内容。

对于历史上“侠”的产生，前辈学者已有论述。此书不囿于成见，而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更加明确而又合理地论述了“侠”的定义和起源、“侠”的行为准则、“侠”的分类以及“侠”与儒墨道法各家的关系。

对于中国武侠小说的源流，此书的著者在论述了武侠小说形成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的第一篇武侠小说是《燕丹子》。接着对我国武侠小说的嬗变、发展进行分期，提出了雏形期、成熟期、盛行期、狂潮期、兴旺发达期等概念，同时对《水浒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地位、影响及招安悲剧的意义发表了新的见解，不失为对《水浒》学研究的一家之言。

此书还大胆提出了许多新颖观点和独创见解，诸如侠与盗的交互影响作用，武侠小说史上的两条发展线，武侠公案小说，侠情小说，小说“武功”的发展历程，武侠小说与欧洲骑士文学的区别，武侠小说对民族文化心理的作用和中国传统对武侠小说产生的影响，奇幻型武侠小说的再评价，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区别，海外新派武侠小说与大陆武侠小说的比较，民国年间小说界“超技击”三大家的比较，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三大家的比较，对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总体评价与展望等，都是在大量地占有材料后，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全方位的角度去认真观察和思索后提出来的，因而也就有说服力。

罗立群同志一向酷爱武侠小说，醉心武术习练，并撰写武侠小说研究的论文。198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古代小说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三年以来，刻苦学习，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古代哲学、美学、小说理论、文化史等方面的书籍，更集中精力研究武侠小说，发表的文章有《论唐代武侠小说》、《侠与文学和社会》、《谈剑说侠》、《复仇与女

侠》等。硕士论文《武侠小说的演变及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受到好评。现在完成的《中国武侠小说史》，乃是数年不懈努力的丰硕成果，必将对古代小说研究发生积极的作用，故乐而为之序。

1989年6月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

目 录

序

第一章 绪论	1
一、侠的起源	2
二、侠与盗	10
三、武侠小说的演变	13
四、小说“武功”	21
五、旧派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	24
六、武侠小说与民族文化心理	27
七、武侠小说与骑士文学	34
八、武侠小说的定名和范围	36
第二章 武侠小说的雏形期	40
一、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的影响	40
二、最早的一篇武侠小说《燕丹子》	46
三、魏晋小说中诡奇怪诞的侠客	50
第三章 武侠小说的成熟期	55
一、唐代武侠小说的繁荣	55
二、唐代武侠小说的内容	58
三、唐代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	64
四、唐代武侠小说的地位和影响	73
五、宋元文言的模仿之作	75
第四章 明代短篇武侠小说	82

一、 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	86
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的内容	87
明代白话短篇武侠小说中的“武功”	97
二、 明代文言武侠小说及《剑侠传》	101
第五章 武侠小说史上的里程碑《水浒传》	108
一、 《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侠盗意识	110
二、 《水浒传》与《史记·游侠列传》	113
三、 梁山上的“盗气”	117
四、 水浒英雄的行侠特征	121
五、 真实而传奇的武侠世界	123
六、 侠的悲惨结局	129
七、 《水浒传》的地位和影响	132
第六章 武侠小说的盛行期	134
一、 明末至晚清武侠小说总论	135
二、 承《水浒传》余绪的“忠义盗侠”小说	143
《禅真逸史》	144
《水浒后传》	148
《后水浒传》	150
《荡寇志》	153
《绿牡丹全传》	156
三、 武侠公案小说	158
《施公案》	159
《忠烈侠义传》	162
四、 幻想剑仙小说	167
《济公全传》	168
《七剑十三侠》	171
五、 儿女英雄小说	173

《侠义风月传》	174
《三门街》	177
《儿女英雄传》	179
六、文言短篇武侠小说和《续剑侠传》	183
第七章 武侠小说的狂潮期（1911—1949）	193
一、民国年间武侠小说总论.....	193
二、武坛两巨子“南向北赵”	203
《江湖奇侠传》	205
《近代侠义英雄传》	207
《奇侠精忠传》	210
三、武坛三健将：姚民哀、顾明道、文公直.....	211
《四海群龙记》	213
《荒江女侠》	216
《碧血丹心》三部曲	219
四、奇幻绝伦的“剑仙”李寿民.....	222
《蜀山剑侠传》	224
五、凄绝哀婉的“情侠”王度庐.....	237
《鹤惊昆仑》	239
《宝剑金钗》	240
《剑气珠光》	243
《卧虎藏龙》	245
《铁骑银瓶》	248
《燕市侠伶》	252
六、“超技击”大家白羽、郑证因.....	252
《十二金钱镖》	254
《偷拳》	258
《鹰爪王》	260

七、采撷众长，自立门户的朱贞木	264
《七杀碑》	265
《虎啸龙吟》	268
《罗刹夫人》	270
第八章 兴旺发达的当代武侠小说	275
一、港台及海外新派武侠小说总论	275
港台及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概况	275
港台及海外新派武侠小说兴起的原因	276
对港台及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总体评价	278
二、武林长者梁羽生	281
《萍踪侠影》	288
《狂侠天骄魔女》	291
《牧野流星》	294
《女帝奇英传》	296
三、武林盟主金庸	299
武功的不同凡响	301
现实的深入思考	304
人物的立意与创新	307
价值取向与技巧运用	314
庄谐参伍的独特风格	316
四、武林怪杰古龙	320
《侠盗楚留香》	326
《七种武器》	334
《多情剑客无情剑》	338
《风云第一刀》	340
五、大陆武侠小说的发展情况	343
《津门大侠霍元甲》	346

《总统与大侠》	343
《神州擂》	350
《翡翠塔传奇》	351
《奇侠姻缘》和《血溅鸳鸯帐》	352
《追魂箫与无形剑》	355
《达摩剑》	357
附录： 1. 中国武侠小说书目	360
2. 武侠小说研究专著、论文目录	376

第一章 絮 论

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自古至今，武侠小说一直流传不衰，尤其是当代，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名家为代表的“新武侠”流派，无论在思想内涵，或是叙事技巧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海内外一个社会层面相当广大的读者群，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种现象表明，武侠小说和中国绝大多数读者之间隐伏着文化心理的联系和审美传统的一致，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视野共同融汇于统一的历史文化背景中。

与上述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艺理论界对此熟视无睹，对武侠小说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研究武侠小说者甚少，似乎一加研究，就会大跌身价。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古往今来的武侠小说成功传世者少，大多是内容浅俗，艺术低劣之作。由此，人们产生出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是写闯荡江湖、行侠仗义题材的小说，格调必定不高，也不会产生出好的社会效益，从而形成一种“题材决定论”。其二是有人以为武侠小说纯属臆想和杜撰的产物。作者可以完全抛开事实真象和其他约束，不受时、空的局限，信笔一挥，洋洋万言，缺乏严肃的直面人生的态度和深刻广泛的思想内涵，纯是商业性质的笔墨游戏，不值一顾。其实这两种看法都失之偏颇。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以题材而论，无论历史、志怪、言情小说，都有众多的劣作和少数的传世名著，武

侠小说亦不例外。《水浒传》就是专写江湖人物的豪情苦闷、义气行侠的，其描绘出色的人物都是侠气纵横的英雄形象，其传奇的故事情节，也很有侠气的色彩，说它是古代武侠小说的珍品，毫不过分。可见，单凭题材判定作品的高下优劣，有欠公允。再者，创作武侠小说看似容易，要写好却是相当困难。单以情节结构而论，虽属虚构，却须要有天才的想象能力，环环相扣，层层生奇。优秀的武侠小说须做到：情节荒诞不经却又近情入理，人物纯为虚构而又生动可信。在内容上，注重历史文化背景，增加现实生活的厚度，融入各方面的知识。读者在阅读作品时，一方面娱乐消遣，另一方面又咀嚼着作者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索。武侠小说要达到这种境界，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对武侠小说及其产生的文化现象保持沉默，不作理论上的深入研讨，这对提高武侠小说创作以及指导读者正确地阅读和欣赏武侠小说都是不利的。基于此，本书试图对武侠小说的源流、发展、得失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民众文化心理的关系，作一粗浅探讨。

一、侠的起源

考察侠在文学中的表现，首先应从历史文化入手弄清楚什么叫侠。“侠”一词语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五蠹》又云：“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六反》曰：“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这两段可以看作是“侠以武犯禁”的解释。韩非子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阐释“侠”的，所指出的只是“侠”的好武斗勇、目无法纪的一面，而后世所颂扬的“侠”并非都是这样的。

《说文解字》对“侠”是这样解释的：“俠，傳也，从人夾声。”段注：“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俠，粵也，按俠之言，夾也。夾者，持也。”这里所强调的一是“相与信”“同是非”的任侠气度，二是“权行州里，力折公侯”的任侠能力，比韩非子的解释进了一层。

汉代司马迁首次给“侠”立传，并明确地为“侠”下了定义。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游侠列传》）从司马迁的阐述及所描写的人物言行中，我们终于全面了解了“侠”的人生观和行为特征，即助人为乐，公平，正直，重友谊，讲信义，不图报答，并且还有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不受世俗约束的“不轨于正义”的行为。这种侠，司马迁称之为“游侠”；因为活动于闾巷之间，又称为“闾巷之侠”；因为他们出身贫贱，且不与官府合作，故又称“布衣之侠”。与之相对的，有所谓“卿相之侠”，如季札、战国四公子之流。他们广养门客，礼贤下士，为君分忧，为国解难，因此也可当一“侠”字。从史书记载来看，以侠的行侠方式区分，可分为“文”“武”两类。朱家、郭解、季札、鲁仲连等人，既不喜武好勇，也不精于武功，是“文侠”。《刺客列传》中诸刺客^①及朱亥、毛遂等人，喜好勇力，又往往藉武力解决争端，其行为颇有点近似于韩非子所谈到的“带剑者”。他们奉行“士为知己者死”，即恩仇必报的人生哲学，堪称“武侠”。后世推崇的“侠”是“文侠”和“武侠”的结合

体，所颂扬和继承的侠之精神则主要是游侠精神。

唐李德裕《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不管文侠或武侠，其行为都离不开“义”。侠之“义”乃是侠之所以为侠的精神支柱。何谓“义”？《中庸》引孔子云：“义者，宜也。”朱熹《四书集注》解释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胡适解释道：“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②陈拱也解释说：“而义即是‘宜’，亦即是‘适当’、‘合理’的意思。”^③《孟子·离娄》亦云：“义，人之正路也。”也即是指人应该走的路。如是，则“义”当为“正义”“合理”“应该”。然而什么才是“正义”“合理”“应该”的呢？各人看法不一。于是“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伸缩性很大，无法统一，正所谓“天下之人异义，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多，其所谓义者亦兹众。”^④从史传中所记载的著名侠士，如战国四公子、朱亥、唐雎、冯煖、朱家、郭解等人的言行来看，侠对义的理解主要着眼于“助人”、“重言诺”，这便是侠义精神。凡按照侠义精神行为处世者，即言行符合“侠义”的人，便是侠。

关于侠的起源，前辈学者或从时代背景予以论述，认为侠产生于古代社会封建制度崩溃以后（即春秋末战国之际）^⑤；或从侠的社会出身着眼，有认为出于儒的^⑥，有认为出于墨的^⑦，有说出于士的^⑧，也有说出于游民的^⑨。然而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从社会出身论证侠的起源是不妥的。侠的出身很杂，朱亥是屠夫，侯羸是守门人，冯煖、荆轲是门客，战国四公子是王公贵族，朱家是财主，郭解是平民。他们中有文侠，也有武侠，有布衣之侠，也有卿相之侠。可见侠的出身不同，他们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从有关史料来看，侠也

不是一种专门职业。行侠的人来自不同的阶层，各操一业，行侠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侠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们并非靠行侠谋生，这是二。侠之行侠，是乐为此道，或曰为侠义精神所驱使，因此正如刘若愚在《中国的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中所指出的：侠气出于天性，侠之为侠是个人气质使然。这是三。有此三点，大可不必拘泥于侠的出身决定侠的起源一说了。

至于时代背景，就文献记载，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侠产生于春秋时期，如崔奉源在《中国古典短篇侠义小说研究》一书中就指出是曹沫。但是，我们既认为侠之为侠离不开个人气质，就应探讨一下这气质所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沿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去寻找它的渊源。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压迫和剥削。从历史上看，有文字记载的暴君就有夏桀、商纣王和周厉王等。王公大臣尚可任意杀戮，更不用说一般平民和奴隶了。由于这种种的世间不平，加之自然界对人类的侵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便渴望有人出来秉持正义，排除危难，而这一切也必定会激起一些人的正义感、良知和勇气。从文化心理上看，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英雄主义精神，崇尚献身与复仇，在与恶人及大自然作斗争时，尤其如此。《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远古神话，便是这种民族心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娲、后羿等人堪为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大侠。除此之外，侠之所以为侠还具有浓厚的生理人性决定色彩：气血个性，天赋良知。这些生理人性决定了侠在处理问题时，按照“侠义”的道德标准行事，即仗义行侠。这样看来，侠的起源有二点：社会上有不平或危难之事，这是外因；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扬及个人的气质、血性和良

知，这是内因。明乎此，对于侠的起源问题，我们就不会执著于某一时代、某一阶层了。

虽然我们断定侠不出于某一特定时代、特定阶层，但原始侠者的理想与行为却显然同早期的“儒”、“墨”、“道”各家均有关涉，其文化精神有相通和相互影响之处。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韩非子将儒和侠相提并论，给予等量齐观的罪名，说明儒和侠在价值认同与人格观念上实有相似点。《礼记·儒行篇》是这样谈“儒”的：

“儒者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儒有委以货财，见利不亏其义；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分国如锱铢，而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言诺、讲信义、不怕死、不图利、特立独行而又睥睨王侯的大侠的影子。儒家的代表人物皆深具侠气。孔子推崇“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⑩，孟子赞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⑪，曾参肯定“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君子”^⑫，颜渊重名轻财，子路殉身取义，就连孔子本人也在夹谷会上置危险于不顾，据理力争，指顾之间而定大局。可知儒家所追求的理想风范与侠的言行极为相似，在积极入世之精神上，儒与侠实为一体之两面(一文一武)。正因为此，许多人认定侠产生于儒，更有人直呼“儒侠”。但必须指出，儒与侠是有区别的，两者在观念、性格和作风上又常常是相互

恬悟的。首先，儒家主张伦理道德，推而广之，则须各尽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⑯，重礼乐，尚贤孝，维系起一个礼乐规范的伦理性社会。侠不十分看重伦理，与人相交纯重信诺，公称“士为知己者死”，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⑰这种行为在儒家看来，就破坏了秩序井然的伦理型社会。其次，儒家讲求内省，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信奉中庸，讲究“恕”、“让”，行为强调适可而止，所谓“过犹不及”^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⑲。侠则纯是以个人是非为是非，突出个性自由，不拘细节，任性而为，根本不顾及传统习俗与社会舆论，在感情和行为上偏好走极端，不以礼法为意。因此，儒生的性格偏于守成，侠的性格富于开拓；儒遵循先师遗训，侠看重功利言行；儒不提倡暴力，侠则往往凭借武力获得正义。再者，儒与侠对“义”的理解不同。儒与侠都认为“义”为合理、正义，都认为它是人生的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但涉及具体内容则差别悬殊。儒家谈“义”通常和“仁”连在一起。《中庸》引孔子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孟子·告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离娄》：“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董仲舒解释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以仁安人，以义正我”。^⑳儒家还经常将“义”与“利”对比，《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可见，在儒家看来，“义”指一种合乎礼义的行为节操。这种理解与上述侠对“义”的看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儒与侠不应等量齐观。

与侠最为接近最有关联的应推墨家，墨子弟子三百人，皆